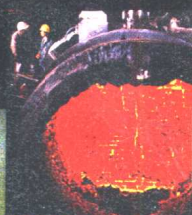


2 0 2 0 年 的 中 国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 共享 增长的收入



# 共享增长的收入

##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Copyright© 1997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 W.  
Washington, D. C. 20433, U. S. A.

版权所有

中国出品

1998年3月中文版第1次印刷

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的准确性,也不对引用这些数据导致的任何后果承担任何责任。本书的任意一幅地图中显示的疆界、颜色、名称及其他信息不代表世界银行集团对任何领土的法律地位的判断或对该疆界的认同或接受。

本出版物的资料已经版权登记。希望复制本书内容的申请,应按上述版权声明所示地址,向世界银行出版办公室(Office of Publisher)提出。世界银行鼓励传播其出版物,通常会立即给予许可,对于非商业目的的复制不收取费用。复制本书部分章节用于课堂教学的许可证由美国的版权许可中心签发,地址: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Inc. Suite 910,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ssachusetts 01923, U. S. A.

封面照片摄影: Claus Meyer/Black Star.

封面插图(从左至右): Vince Streano/Aristock. Inc.; Dennis Cox/China Stock, Serge Attal/Gamma Liaison, Dennis Cox/China Stock, Joe Carini/Pacific Stock, Erica Lansner/Black Star.

ISBN: 0-8213-4076-X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编写组编著.  
李燕生、党海鹏校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020年的中国)

书名原文:Sharing Rising Income: Disparities in China

I. 共… II. ①世… ②李… III. 国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 IV. 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0177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邮政编码:100010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889×1194毫米 16开 5.25印张 132000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ISBN 7-5005-3678-X/F·3380

图字01-97-1961号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致 谢

本报告是 Tamar Manuelyan Atinc 在许多人的协助下编写的。1996 年 7 月特派团出访期间与不同的中国官员进行了讨论，这对于确定当局所面临的挑战及理解影响收入分配的政策演变的体制背景特别有帮助。特派团由 Tamar Manuelyan Atinc、Valerie Charles Albert Keidel 和 Julia Li 组成，他们特别感谢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地地区司的大力帮助。十分感谢陈宣庆 (Chen Xuan Qing) 先生，陈翔 (Chen Xiang) 先生和杨潘贵 (Yan Pangui) 先生个人所做的贡献。

没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合作，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进行。城市和农村住户调查组提供的资料和国家统计局研究所提供的背景文件是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还获益于许多对收入不均这一题目有浓厚兴趣的学者提出的分析结果，包括以背景文件形式提出的分析结果。世界银行内部的人士包括：Shaohua Chen、Yuri Dikhanov、Francisco Ferreira、Marcel Fratzscher、Shaikh Hossain、Martin Ravallion、Aart

Kraay、Christine Wong、Colin Xu、Xiaoqing Yu、Tao Zhang 和 Heng - Fu Zou。世界银行外的人士，如 Robin Burgess（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和 Calla Wiemer（夏威夷大学）也对报告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本报告还得到有关评论家指出的一些宝贵意见，如 Stephen Howes（世界银行），Nora Lustig（布鲁金斯学院），Carl Riskin（哥伦比亚大学），以及 Lyn Squire（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大量的时间和建议，包括 Vinod

Ahuja, Liang Li, Natalie Lichtenstein, Andrew Mason, Richard Newfarmer, Vikram Nehru 和 Alan Piazza。Bonita Brindley 对本报告的撰写提出了宝贵意见。Klaus Rohland 和 Nicholas Hope 提供了战略性指导和良好的管理与安排。

本报告的编辑是 Meta de Coquereaumont 和 Paul Holtz，版面安排 Damon Iacovelli 和 Laurel Morais，设计 Kim Bieler。上述人员均属传播发展公司美国语写作部。

中国自从 1978 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令人瞩目的年均 8.2% 的速度增长。市场激励提高了人力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使雇用方式多样化并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总体上，有多达两亿人脱贫。

但是，增长的好处分配不均。由于受过教育的人、适应性强的人和有优质土地的人能够利用新的市场机遇，收入不均现象加重了。这有助于刺激增长。但政府的政策，或者说缺乏政府政策，也加重了这种收入不均现象：社会政策向城市倾斜；经济政策有利于沿海；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劳动力流动性的机会依然不公平或变得更加不公平；男女在经济生活中差距越来越明显。

在抑制收入不均方面政府有明确的作用。在其他地方，严重的收入不均抑制了增长，削弱了扶贫活动，而且助长了社会紧张局面。中国的收入不均现在与美国类似，按国际标准衡量仍属中等。这种收入不均的现象随着中国转型的向前发展，完全可能继续加重。但是，如果同时做到基础广泛的增长，使人们机会均等，并使穷人和易受伤害的人得到保护，那么这一收入不均现象未必对增长和社会和谐有害。中国在向成熟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保持人们平等享有社会服务，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建立保护穷人和易受伤害的人的方案，使社会上人人都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

# 目 录

|                                |        |
|--------------------------------|--------|
| 致谢 .....                       | ( v )  |
| 绪论 .....                       | ( 1 )  |
| 第一章 更富了, 但更不平等了 .....          | ( 5 )  |
| 日益加重的不平等: 全国趋势 .....           | ( 6 )  |
| 摆脱贫困了吗? .....                  | ( 6 )  |
| 第二章 差距日益扩大: 城乡差距和沿海—内陆差距 ..... | ( 13 ) |
| 城乡差距正在扩大 .....                 | ( 13 ) |
| 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等程度取决于计量收入的方法 .....    | ( 15 ) |
| 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           | ( 18 ) |
| 第三章 了解不平等现象 .....              | ( 25 ) |
| 就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               | ( 26 ) |
| 教育日益受到重视 .....                 | ( 29 ) |

|                                |          |
|--------------------------------|----------|
| 土地仍是社会保护的有力手段·····             | (32)     |
| 妇女越来越吃亏·····                   | (36)     |
| <br>第四章 政策与个人福利·····           | <br>(41) |
| 消除有利于较富的人的政策偏向·····            | (41)     |
| 保护绝对贫困者·····                   | (42)     |
| 挖掘准穷人的潜力·····                  | (44)     |
| 关心城市穷人·····                    | (47)     |
| <br>附件一：中国的人口移徙和不平等现象·····     | <br>(51) |
| 附件二：有关中国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移徙的文献综述····· | (57)     |

本报告所用“香港”一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绪 论

自从 1978 年开始改革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中国的基尼系数（测算收入不均的一个常用指标）从 1981 年的 28.8 升高到 1995 年的 38.8。虽然各国的收入不均现象有很大不同，但这么大的变化是不同寻常的，这标志着财产及其收益的分配发生了深层的结构性变革。

收入不均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开始利用人口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曾受到压制。在中国的平等主义达到登峰造极时，个人的报酬很少反映生产率。1978 年，政府引进了个人奖励方法和市场力量，使资本和土地的收益立即开始提高，使雇用方式多样化并增加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毫不奇怪的是，增长的好处分配不平衡，好处归了那些最善于利用越来越多的机会的人，即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有进取心的人、适应性强的人和有优质土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均对于实行改革之后的快速增长是必要的。但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缺乏政策也加剧了收入不均。社会政策对城市比对农村有利，经济政策对沿海比对内陆有利，获得教育、卫生保健和劳动力流动性的机会仍然或者说越来越不平衡。进入更加富足社会的成本妇女比男人更

高。

中国的决策者应该为收入的两极分化担心吗？在其他地方，严重的收入不均阻碍了增长，削弱了扶贫活动而且助长了社会紧张局面。中国的收入不均仍属中等。增长的好处分配不平衡，但这些好处确实也惠及了穷人。还有，迄今为止收入不均加重主要反映出激励机制和报酬结构方面的调整，而这种调整是更具市场经济特征并受到欢迎的。但是，如果不加控制，中国收入不均的某些方面可能阻碍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

当增长的收益不均等地落到一些易被觉察的社会群体——比方说，地域和城乡发展失衡，性别差别——就会造成社会局势紧张，尽管这些不是解释总体收入不均的主要因素。如果较富裕群体总是享受高增长，较不明显的社会紧张状况会造成政局不稳定，并最终损害增长和扶贫工作。不断增加的机会不均等状况也会破坏社会和经济进步。其他地方的经验教训表明，获得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机会的不均往往与更高的收入不均相伴而生，而且会加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决策者们需要抑制城市和农村日益扩大的差距，沿海和内陆拉大的差距，不同收入群体在获得自我提高的机会方面越来越加剧的不平等。

成绩与问题

中国的收入不均迅速加重，但还不属于特别不均的国家之列。现在中国的吉尼系数非常类似于美国，接近东亚的平均数——大大高于东欧国家的数字，但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数字（表 1）。

同时，中国引人注目的增长伴随着在扶贫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自 1978 年开始改革以来，中国已使大约 2 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状态。但进展情况是不平衡的。大部分扶贫是改革之初农村地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出现的。但在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初期，解贫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1992 年以来，重新出现的势头减少了贫困人数。这样到 1995 年底，不到 6% 的人口收入在绝对贫困线以下。

农村的收入增加改变了穷人的统计数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总是导致个人收入的增加，但当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农村的收入时，贫困人数就减少了。如果没有农村收入的增加，由于不利的分配变化，1981—1995 年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数本将增加 1 亿多。但实际上贫困人口却减少了 1.5 亿多。

但是，没什么可以自满的。改革并没有降低农村和城市家庭巨大的福利差别；相反，差距却扩大了。对沿海的优惠政策加强了该地区的自然优势，从而扩大了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差距。市场力量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分割的。如果光由市场来支配社会条件，那么，中国人力资源的质量将越来越不平衡，从而产生基于教育、财产及（越来越多地基于）性别的形形色色的得益者和失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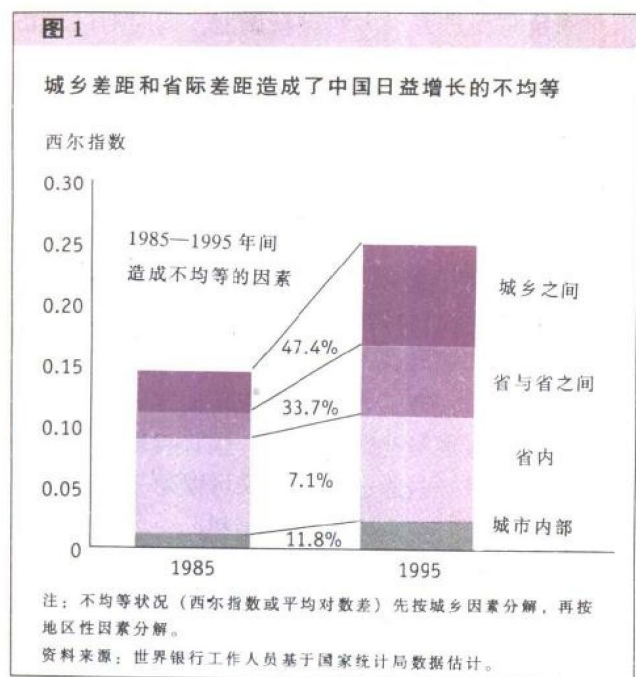
城乡差别在扩大

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农村居民。改革初期农村收入增长迅速，但从 1985 年起就开始落后于城市收入的增长，只在 1995 年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根据官方数据，城乡收入差距占 1995 年总体收入不均的 1/3，占 1985 年以来收入不均加重的 1/2（图 1）。在国际上，城乡收入比很少像中国这样超过 2，在大多数国家低于 1.5。

表 1  
中国在收入不均国际比较中居中  
(吉尼系数)

| 地区或国家           | 80 年代 | 90 年代 |
|-----------------|-------|-------|
| 东欧              | 25.0  | 28.9  |
| 中国 <sup>a</sup> | 28.8  | 38.8  |
| 高收入国家           | 33.2  | 33.8  |
| 南亚              | 35.0  | 31.8  |
| 东亚和太平洋          | 38.7  | 38.1  |
| 中东和北非           | 40.5  | 38.0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43.5  | 47.0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49.8  | 49.3  |

a. 中国的数据为 1981 年和 1995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Deininger 和 Squire (1996 年)；Ahuja 等人(1997 年)。



但即使这一比率也反映不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全部生活水准的差异。一套完善的公家提供的服务——住房、养老金、保健、教育和其他权利——使城市收入平均增加大约 80%。调整数据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占 1995 年总体收入不均的 1/2 以上，占 1985 年以来收入不均加重甚至更大的比重。

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显示出生产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有问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性。尽管对农村外出打工不断膨胀的需求，城市日益通融，但剩余的障碍仍很大，这也说明政府希望控制迁徙速度和保证粮食自给。由于没有住房市场和享受城市地区社会服务的程度有限，对劳动力的流动性也造成额外的限制。

### 地区差距在扩大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沿海省份抓住了靠近世界市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有知识的劳动力带来的机遇。但他们也得益于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刺激了外国投资。结果，省与省之间的收入不均扩大了。这一点约占 1995 年总体收入不均程度的 1/4，占 1985 年以来收入不均加重的 1/3。

1985 年，中国内陆地区居民的收入只有沿海居民的 75%；到 1995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50%。

### 获得机会的权利越来越不平等

人与人之间的资质不同，这表明结局的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助于培养创造力并刺激增长。因此，大多数社会容忍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均。但其程度取决于形成每个社会偏好的历史和文化因素。中国收入不均的加重很大程度上需要联系这个国家体制转型加以评估。转型带来了相对价格的调整，重新估价了人们的资质和特点，这些尤其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这些调整是为人们所接受的。

提高收入和福利的机会的不平等则更加隐蔽，已发现这些也妨碍增长的前景。中国的土地分配仍然高度平等，这有助于保护穷人的营养状况。但是，随着市场导向鼓励公共机构回收成本，获得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权利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还有证据表明，家庭对女孩子的教育和保健投资要少于男孩子。这与劳动力市场对妇女越来越严重的歧视一起，可能削弱妇女的辛苦挣得的收益，而中国曾经将这点看作是国家的骄傲。最后，不完善的劳动力流动性使人们获得较高工资工作的机会不平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是分割的，表现为城市实际上不存在贫困，城市化水平相对低，城乡收入有巨大的差距。

### 相应的政策

随着转型的全面展开，中国的收入不均很可能会继续加重。只要同时做到迅速而基础广泛的增长、消除政策偏向、机会均等和保护穷人和易受伤害的人，上述情况不一定危及增长和社会和谐。

### 保护穷人和易受伤害的人

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对于长期改善所有人的福利是关键，但其他政策可以按人口的阶层区别对待。

绝对贫困者。1995 年中国的绝对贫困者有

7000 万。如果目前的援助计划对象更准确的话,将会以更少的代价减轻更多的贫困。1990 年,将近 50% 的穷人生活在定为享受特别援助计划的贫困县之外的地方。如将目标对准乡镇一级,甚或对准行政村,计划的功效将会提高。

政府还应考虑重新确定扶贫战略的重点。将新的重点放在穷人的基础教育和保健服务方面是至关重要的,还应帮助他们在经济较先进地区找到工作。有必要保证穷人必需的保健服务,并加强公共卫生计划。必须(通过奖学金)补偿贫困家庭教育孩子的费用,在此方面,人口统计的转型减少了学龄儿童数量,这对政府有所帮助。政府帮助穷人在住处就近地区之外的地方找工作的做法应予以加强,因为汇款已证明对减轻农村地区的贫困大有帮助。

准穷人。大约 1 亿人靠每天不足 1 美元维持生计(按 1985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他们几乎一半收入来自粮食,粮食这一部门受到严格的管理。粮食政策的改革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是重要的,更多地融入劳动力市场及进一步办好信贷市场也会有所帮助。欢迎政府作出粮食收购价向市场价看齐的决定。改进运输基础设施和粮食经销系统的改革也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而在农业研究和推广方面花更多的钱将有助于提高单位产量。最重要的是,从低收益粮食生产转向高价值作物或非农业工作将使准穷人受益。但这要求政府愿意进口更多的食品。

城市贫民。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可以忽略不计,但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继续推进城市化,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而明显的问题。中国大城市的失业(包括下岗)已经达到占劳动力的 8%。政府需要更好了解城市贫民的情况,以便制订帮助他们的计划。订立有意义的贫困线是有益的,它同样有助于对失业人员进行系统监测。现在是政府审查其社会保护制度的适当时候了,已经作了大量工作分析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融资制度。应继续针对其他救济金如失业补助金、伤残及劳动力培训和再培训计划作出努力。一项经改进的就业机会

信息系统将促进劳动力的重新调配,同时对以城市为基础的创造就业机会计划的系统评估,可有助于推广计划成败的经验教训。

### 消除政策偏向和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

中国的公共政策往往扩大贫富差距。在如下四个方面来改变政策将裨益于福利和收入分配。

纠正对城市的偏向。国有部门对雇佣、住房、粮食价格、外来打工者、信贷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是对城市居民的事实补贴。其中一些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福利,另一些通过占用本来可以用于更需要的人的公共资源间接影响农民的福利。

取消经济政策中对沿海的偏向。沿海省份的自然和人力资本优势已经足以吸引外国投资,不需要通过优惠政策来加强这些优势。此外,改革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计划将有助于降低各省之间公共支出的差距;政府应加速这一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在解决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的过程中有利于内陆地区的政策也可能有效,但最好就一揽子地区发展政策再做些研究工作。地区发展方案方面的国际经验一般来说都是反面的,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过系统的分析。

在家庭分配决定上和市场上取消性别偏向。教育津贴可以鼓励家庭让女童接受教育。政府应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避免在福利待遇上歧视。有关规定和企业拿出的补贴结合在一起,可以分摊养育孩子的费用(这通常由妇女单独承担)。

合理地对待富人。中国一些新富的致富是靠长期的勤劳,冒着巨大的风险,得益于新的市场机遇。但是其他一些人则利用中国不完整的转型,敛取不义之财。中国政府着重注意后面这些人是对的。为了打击腐败现象和制止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加强其监管职能。这要求减少官员的随意处置权,制定公共决策(例如政府采购)的明确而有透明度的规则;通过适当监管金融市场杜绝获得内幕信息的机会。

# 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1981年，该国同罗马尼亚、波兰、芬兰和荷兰一样，是平等主义观念极强的社会。但是，经济增长明显改变了这种状况，按目前的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收入不均差不多达到了中等程度（图 1.1）。1981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对收入分配不均的一种测算方法，0 指绝对平均，100 指绝对不平均）为 28.8，1995 年为 38.8，这一系数低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甚至是东亚国家，它与美国类似，但高于东欧大多数转轨国家和西欧许多高收入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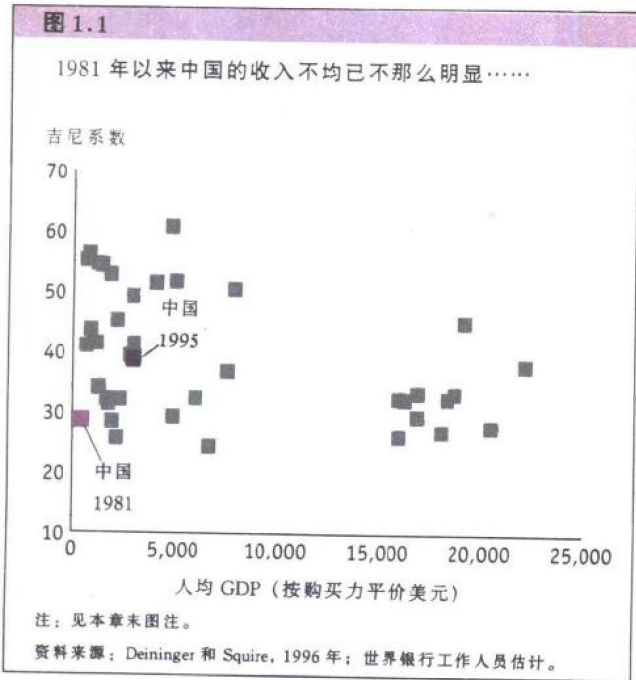
在有可比数据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吉尼系数的增幅是迄今最大的（图 1.2）。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不同寻常的。各国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大不相同，但某一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收入分配水平却十分稳定（Deininger 和 Squire, 1996 年）。当收入分配水平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时，一般预示着资产的基本分配及其收益率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最近的实例主要来自转轨国家，但是泰国、英国和巴西也有过收入不均大大加重的经历。

不过，即使与这些国家比，中国最近的情况也是突出的。过去 15 年来，东欧转轨国家和前苏联的不平等状况虽日益加重，但

也不像中国那么严重，而在同期，东亚某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已有所减轻。

日益加重的不平等：全国趋势

不论如何测算不平等的程度，中国的收入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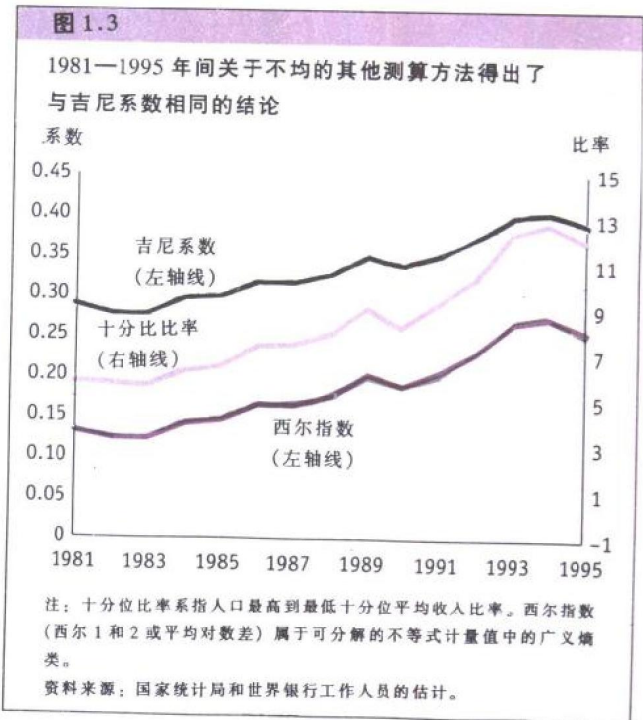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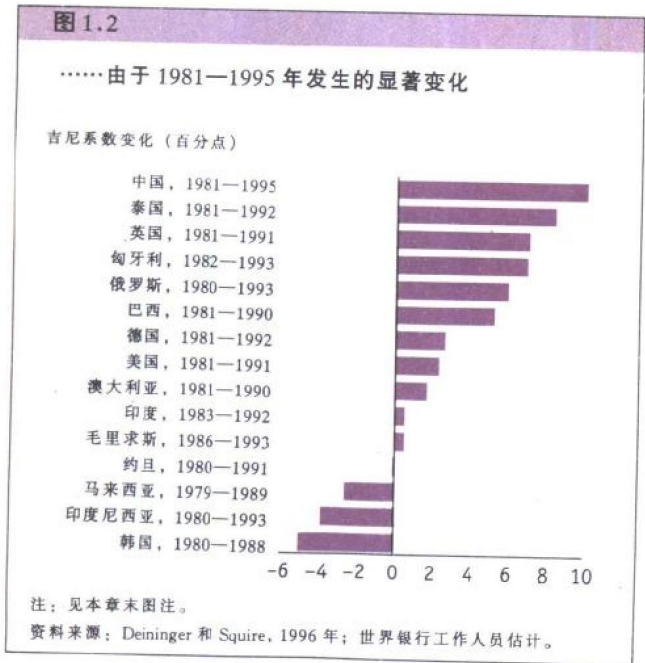


状况已越来越不均等（图 1.3）。尽管中国家庭调查数据存在许多缺陷，但这一结论依然是成立的（专栏 1.1）。十分位比率（即人口中收入最多的 10% 这部分人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少的 10% 这部分人的平均收入之比）一直在上升，特别是从 1990 年开始，上升得更明显，这说明最富人群与最贫困人群的差距扩大了。

自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的个人收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专栏 1.2）<sup>1</sup>。1981 年至 1984 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所有阶层普遍享受到福利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均只是略有加重。1984 年至 1989 年，个人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不均，这意味着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下降了。1990 年至 1995 年，收入的重新增长惠及社会较贫困阶层（但不是最贫困阶层），但也带来了收入不均程度的大幅度上升。

摆脱贫困了吗？

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自 1978 年开始进行改革以来，中国已使约 2 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大部分扶贫工作是在改革之初进行



## 调查数据的缺陷——本报告如何处理这些缺陷

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结果，分析了中国收入分配情况。这些调查有许多缺陷，但它们依然不失为其时间跨度足以评估全国收入状况的唯一综合数据来源（农村问题调查讨论详情，见世界银行，1992年和Chen, Ravallion, 1996年）。关于这项调查的主要问题涉及到范围、定义和数据收集后的处理：

- 调查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未统计流入城市地区无户口的外来打工人员而获得户口的外来打工者寥寥无几，因此这种遗漏现象十分严重，而且有增无已。
- 中国城镇和农村调查是根据不配套的收入定义进行的，因而降低了可比性，而且无法得出全国分配汇总数。
- 有关数据未说明生活费的区域差异。因此，既不能在城镇和农村调查的范围内系统处理地区差异，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处理城乡的差异。
- 城镇住户调查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福利等实物收入。此外，调查似乎主要是记录劳动者收入，因而遗漏了许多新近富有者的收入。
- 《1989—1995年国家统计局年鉴》所载城市数据摘要由于存在汇总的问题，低估了城市收入不均的状况。
- 农村住户调查在1990年前还按官方价格对粮食实物收入进行估价，这极大地低估了农村收入。1990年以后直至最近，对自用粮消费是按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加权平均数估算的，但各省的做法不同。这给分析一段时间内和省与省之间的趋势造成了困难。
- 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资格”和“收入”定义均发生了变化。1985年，城市居住资格已扩大到某些城市边缘地区；收入调查中所包括的养老金领取者数据只是从1985年起才开始具备。

报告除了记载南方四省（广西、贵州、广东、云

南）1985年至1990年的农村数据以及四川省和江苏省1990年的农村和城市数据外，未获得单独的住户数据。因此，无法对上述确认的各种缺陷进行系统的矫正。不过，为了说明由此而对不均等产生影响的程度和方向，本报告的不同章节已作部分调查。眼下还不能确定这些和其他必要的矫正所产生的总的的影响。与国家统计局进一步合作是必要的，这既可以证实报告的调查结论是否可靠，又有助于改进今后的调查计划和制表方法。报告分析包括如下几项调整：

- 对外来打工者生活水平的讨论只能根据外来打工人口的专门调查进行，无法纳入整个收入分配的调查中。
- 确定国家趋势的依据，主要是将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汇总成全国收入分配数据，未对收入定义和空间价格差异进行任何调整。
- 但是某些指示性调整有助于对收入不均的构成提供更加精确的描述：利用从国家统计局获得的资料和四个省的农村数据集，对城市和农村的平均收入进行了调整，以包括实物收入；采用了生活费差异，以说明城市地区价格较高的原因。
- 利用四个省的数据集，对粮食定价、生活费差额以及住房和耐用消费品的估价进行了更正。这样做可以对一段时期内的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和变化进行更加精确的估价。
- 对1989—1995年，报告采用了由国家统计局北京分局汇总的但来自调查的一个子样本的城市数据，它始终比所公布的数据要高。
- 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90年和1995年资料，调查了实物收入对城市收入不均的程度和变化产生的影响。
- 对收入不均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分析，主要依靠现有微观数据，因而对测算方法的变化反应敏感。

的，当时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尽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逐步增长，但贫困程度并未下降（某些年还有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因为不平等现象一旦加重，将具有特别大的危害性，穷人将依旧贫穷，甚至会更穷，而富人则更富。自1992年以来，贫困程度明显减

轻，到1995年底，收入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不到总人口的6%。

总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助于减轻这个时期的贫困状况（图1.4和1.5）。1981至1995年，增长贫困弹性接近-0.5，这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贫困人数就减少0.5%。但是，这种结果掩盖了不同时期国内生产

## 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1981—1995 年：三个时期的状况

## 既增长又平等

中国于 1978 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并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促进增加个人收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一点现已众所周知。1981 年至 1984 年，国民收入分配曲线移向右侧（见上图），表明人们从改革中普遍获得了实惠。这一时期，每年实际平均收入增加 12.6%（以实值计算）。1984 年曲线有些扁平形，这表明同 1981 年相比，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强，但在平均收入水平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依然相当均等。1981 年至 1984 年，吉尼系数略有增加，从 28.8 增至 29.7。

## 既不平等又没有什么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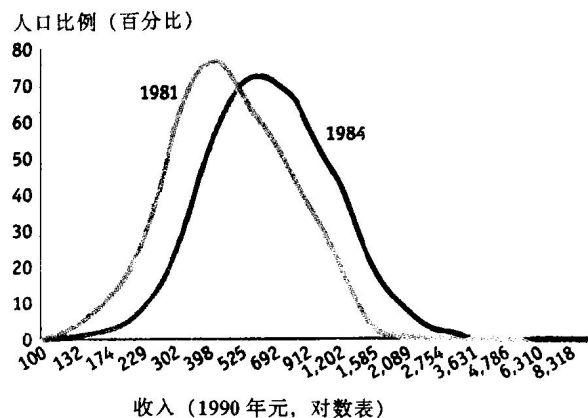
1984 年至 1989 年，收入分配曲线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1989 年不平等现象显然加重，而且曲线更短更宽，表明吉尼系数已从 29.7 变为 34.9（见中图）。有意思的是，分配的这种巨大改变是在个人收入没有多大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1984 年至 1989 年，每年平均收入增长不到 1%。同时，人口最高的 10% 的平均收入增加了 2.8%（移至右尾的右边），最低的 10% 平均收入下降了 4.5%（移至左尾的左边）。收入只是从第六个十分位开始出现正增长。上述变化表明，这一时期贫困指示数日益恶化，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1989 年曲线向右上方凸出）。

## 增长但收入不均

1990 年至 1995 年，个人收入重新恢复增长（每年增长 7.1%），同时不平等程度明显加剧（见下图）。在这个阶段，吉尼系数从 33.9 增至 38.8。但是，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口也从增长中获得了好处，这可能不包括收入极低的那些人口（按 1990 年价格计算，其年收入低于 190 元）。1990 年至 1995 年，处于十分位最底层的 10% 的人口的收入（每年低于 337 元）年增加 1.7%，但其中大部分收益是在 1994 年至 1995 年当这类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 6.7% 时出现的。1990 年至 1995 年，处于十分位最上层的 10% 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年增长 9.7%，而 1990 年至 1994 年，则达到 12.1%。1995 年的增长对收入分配平等化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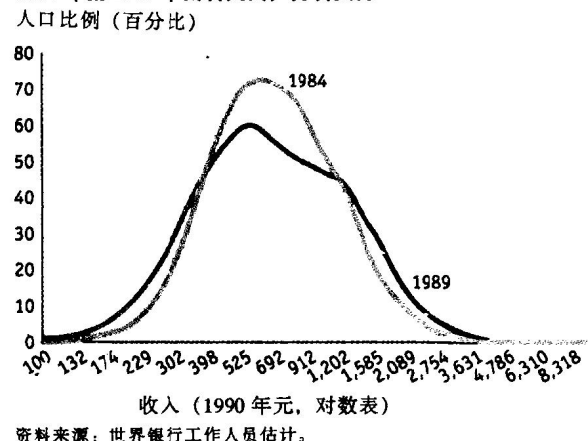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 1981 年至 1994 年，各阶层的中国人都从改革中获得实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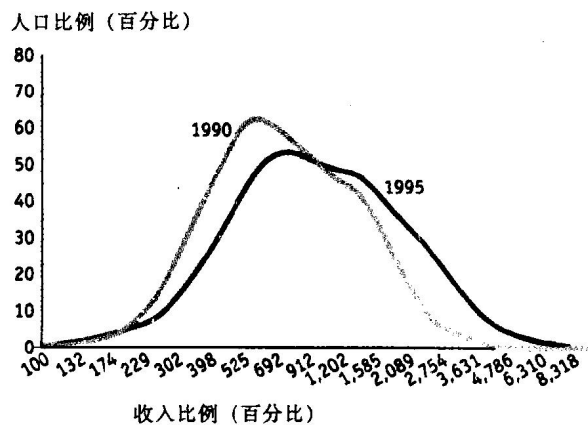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 1984 年至 1989 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 1990 年至 1995 年大多数人更加富裕，但收入不均明显加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总值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是有很不同的。1981年至1984年以及1993年至199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大增长（年增长率约为10%），贫困弹性分别为-3.6和-1.7。1985年至199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可观（年增长率为7.4%），而贫困弹性却（略）呈正向，这

表明该时期贫困人数有所增加。

在中国，贫困是农村存在的一种现象。甚至早在1981年，农村人口中就有28%处于绝对贫困之中，而城市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0.3%。因此，对减轻贫困来说，农村经济增长很可能比总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事实上，在1981年至1995年，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有关的贫困弹性很大，而且它并不展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上所看到的变化。1985—1992年农村收入停止增长时，扶贫工作也停滞下来（图1.6）。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表现为1985年以前和1992年之后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贫困者就能获得很大的好处（图1.7）。这表明农村收入增长的分布比较均衡。

在1985—1992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难以理解的现象——它需要进一步调查——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差异。在此期间，个人收入停滞不前既影响到农村人口，也影响到城镇人口，以至个人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由1984年的顶峰占60%降至1993年只占45%<sup>2</sup>。对此有数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这些数字精确地反映了趋势，那么，这一时期内企业和/或政府的储蓄应有大幅度增加。但是现有的数据证明不了这一观点。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个人收入的增长被少报了（部分原因是外来打工者在城市地区的支出被遗漏了），或是国内生产总值被高估了（也许是由于对缩减指数的低估）。

农村收入的增长对减轻贫困至关重要。如果将增长和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分别分析，则表明，由于分配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在未出现农村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贫困者人数本会增加50%（图1.8）。自从改革开始以来，只有两年，即1985年和1990年的分配变化似乎对贫困者有利，而且这有可能是计算方法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两年对家庭调查进行了很大的调整<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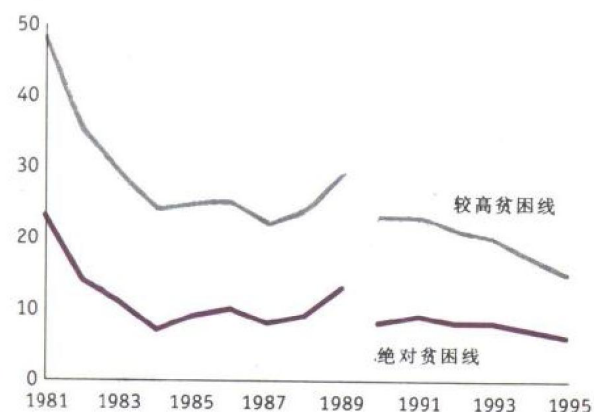
这些经验表明，在中国的扶贫战略中，应始终将再分配政策置于次要地位。鉴于大规模改变分配制度所造成的政治困难以及有可能对增长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应当通过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来增加农村收入。在这方面，必须采取措施增加穷人的资产（土地和人力资本），以减轻贫困和最终导致更加均

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 9

图 1.4

自改革开始以来，贫困现象明显下降……

人口比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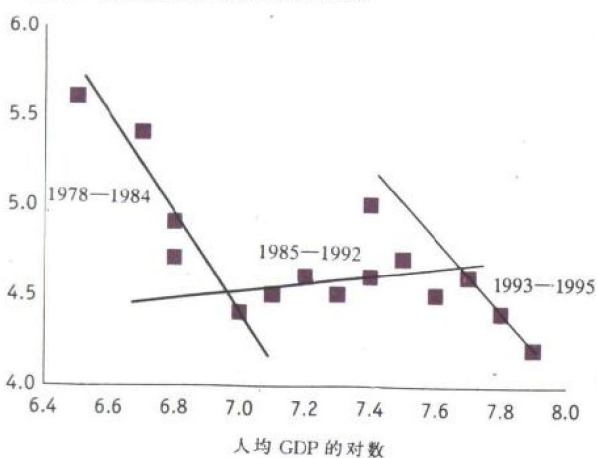
注：1990年，中国的住户调查采用了较为精确的定价准则，从而形成了一种非连续性数列。另见本章末图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

图 1.5

……但人均GDP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直不稳定

贫困率（按绝对贫困调查人数的对数）



注：见本章末图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与世界银行工作人员估计。